

族群

ETHNIC POLITICS

政治

关凯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ETHNIC POLITICS

族群政治

关 凯◎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族群政治/关凯 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81108-443-6

I. 族... II. 关... III. 种族政治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466 号

族群政治

作 者 关 凯

责任编辑 覃录辉

策划编辑 沙 平

封面设计 张日河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90 千字

印 数 2000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443-6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一：探索民族问题的本质

Probe into the Essence of Ethnic Issues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民族”是一个被简单化并被轻视和冷淡的概念。不少学者认为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民族认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正在迅速衰落。在用阶级观念划分人群的社会主义阵营，阶级是超越民族的，民族被认定即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消亡。勃列日涅夫就曾在苏共 24 大上宣布，苏联的一百多个民族已经融合成了一个苏维埃民族。在西方也是如此，信奉同化理论的美国主流社会踌躇满志地等待着各少数民族被盎格鲁—萨克逊化，或是美国化，他们也同样认为民族之间的界线正在逐渐消失，民族迟早要消亡。

到了 90 年代以后，民族问题却迅速成为各国学者瞩目的焦点。民族、族群、认同等词汇在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有关的研究迅速升温。学术界的这种急剧变化，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动态，而是直接源自冷战后国际形势的突变。

历史上，所有的帝国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多样性否定的基础上的。因此，在美苏两大帝国主宰世界的冷战时期，两霸所建立的两大阵营压抑了所有其它人类群体认同的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长期受到压抑的各种民族主义和各种信仰得以释放，其标志是出现了全球性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和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世界从两极霸权走向政治和意识形态多极化，当民族主义、政治多极化理念被扩大化以后，人们所效忠、信仰的团体及其观念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现象。

两霸间的冷战结束了，但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停止。于是，当今世界各冲突热点，由过去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让位于各种群体间的冲突了。人类形形色色无数群体的划分，源自人们各不相同的认同观念。人们为什么和如何去认同各自的群体呢？世界的新形势和新的矛盾冲突推动越来越多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这个问题。

人为什么会有群体认同意识呢？学者们有多种解释：

其一，从生物学角度解释的自我分类理论。认为同类相融，异类相斥是一种生物现象，是人的一种本能。人一生下来，要认识自我，就要对客观世界进行分门别类以便于将自己归入某一类。分门别类是人天生的一种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和社会的一种方式。人天生就要划分自我和非我的区别，同时，任何人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他首先是作为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一员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人将自我和非我的这种划分扩大了，就是我团体和他团体的划分。

其二，从心理学角度解释的精神需要。任何人的生存都离不开社会和群体。不仅从物质、生理上是如此，从精神、心理上看也是如此。人都是单独的个体，作为个体的人，他时时处处都有融入、归入某一团体的心理需要，即认同或被认同的需要。于是人类社会就有各种环境下，各种场景中的认同方式和组织。例如：各种同行组织、妇女组织、农会、工会、各种党派组织、同乡、同学、民族、宗教、国家等。每个人都有多种归属的认同，帮助他在不同的场合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而不致成为孤单一人。

其三，资源竞争理论。竞争或冲突是造成人类分群的主要原因。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群体间斗争为主轴的历史，将人类社会的群体竞争归因于资源的竞争，这种竞争强化了不同群体间的区别，也强化了个人对某一团体的认同意识。

目前，国内外学者无论持哪种观点，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如何，民族属性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属性之一。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各种民族矛盾和冲突都与此有直接关联。

于是，全世界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界都卷入了族群问题研究的热潮，发表的成果汗牛充栋，其中多有真知灼见，但距离解释清楚困扰着世界的民族问题，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关凯曾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从事行政与研究十余年，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很多亲身的观察体会，他又先后分别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社会学系和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系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系留学两年，师从沙伯力教授，专门从政治学角度研究民族问题，获哲学硕士（Mphil）学位。这为他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探讨民族问题积累了跨学科的理论背景。

这样的学历和研究经历，使关凯具有远比一般学者更为宽阔深入的国际视野、理论厚度和实际的实践经验。因此，他积多年的思考和经验，主要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族群政治”为题撰写本著作，对族群问题的本质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辑过程。

其书结合国内外的各种关于民族问题进行的陈述和分析，都与国际学术界相关的各种前沿理论和观点进行了对话，其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对各派理论理解准确，分析鞭辟入里。而且他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固有的这些理论，还提出了很多个人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和更开阔的思索余地。可以看出，作者在族群政治问题上的阐述力图全面完整，这个目标应该说已基本达到，但由于全书篇幅之限制却影响了在一些较重要问题上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在这些问题上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关凯是一位厚积薄发的学者，在这个领域还没有发表很多的著作，但我相信，在众多的相关著作中，他的这项研究成果会很快浮出水面并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

杨圣敏

2007年9月20日

序言二：开拓民族研究的学术视野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Ethnicity Study*

民族和族群问题大概是当今人类社会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各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族群冲突所涉及的问题千头万绪，各国出版关于有关民族现象与专题研究的成果与出版物何止成千上万，但可以说在许多核心问题上至今也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不仅对民族—族群问题的起源、性质和界定说法不一，甚至连“民族”、“族群”这样的称谓在各种语言文字中的定义也仍在讨论之中。

为什么在民族—族群问题的理解和研究领域中，人们这样难于达成一致的观点？我想这很可能与人类社会民族—族群现象产生与演变的特殊复杂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复杂性可能主要来自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由于地球上陆地面积的辽阔和各大洲彼此相对隔绝，各地区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等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了生物物种（包括人类在内）在生存条件方面的多样性，导致了人种起源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各大洲不同人类种族在体质方面的差异，肤色、毛发、骨骼等体质差异就成为人们最早用以界定“种族”的标准。

第二个原因，在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这些生存条件方面的多样性导致了各地区人类群体在人口规模、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差异，进而造成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组织的多样性，体现在社会组织规模与形式差异等方面。几千年前在亚洲、中东的广阔平原上就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和复杂的社会组织，而在澳洲、北美和太平洋上一些岛屿上直至二百年前仍然居住着一些人口稀少、经济和社会组织不很发达的部落群体。群体人口规模的大小、社会

组织的复杂程度决定了人们对于自己所属群体认同意识的结构和性质。而正是这些群体认同意识的结构与性质方面的差异，最后发展成为今天人们在如何定义“部落”、“部族”、“民族”、“族群”这些核心概念方面时所出现的不同理解。

第三个原因，各地人类群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文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因此社会组织与经济科技发展中的多样性与差距也必然影响到各地人类群体的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在希腊、中东、埃及、印度、中国的古代文明各自之间以及它们与同期非洲、美洲、太平洋岛屿上土著人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在考古发现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

在以上几个方面呈现出的巨大多样性的背景下，多大的人口规模和在哪哪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同质性可以导致人们形成有人口边界、管辖区域、行政权威、法律规范的“部落”或“王国”，并由此最后可以发展出可称之为“民族”或“族群”的群体，建构出一个“民族”或“族群”的认同意识，自然也就出现千变万化、极为复杂的现象。

第四个原因，各地区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与发展速度的变化使得各地的文化与社会组织、行政单元、认同意识总是处在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之中，并使原本在横向比较中就差异极大的“民族”现象在各自的纵向发展中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

第五个原因，在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着各地区人类社会与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动，贸易、征伐、迁移等人口流动使一些地区的文明与观念传播到其他地区。同时在交流过程中人们也发现，由于一些核心概念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场景不同，具有不同的内涵，各地区文化观念在不同文字之间的相互翻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这一问题在今天的“民族”、“族群”研究中尤为突出。举例来说，英文词汇中的“nation”、“ethnicity”、“nationality”或其他文字中的相关词汇如何准确地翻译为中文，就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有些核心概念的传入及译法，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受到一些中介国家的影响，如把英文的“nation”译成汉文“民族”，应当说是近代受到日本译法的影响，“ethnic group”译成汉文的“族群”，可能是受到港台译法的影响，而把汉文的“（少数）民族”译成英文的“nationality”，恐怕也曾受到过前苏联英译法的影响。这就使得今天在我国学者中对民族研究中一些核心概念的理解上出现了很大的歧见。

第六个原因，由于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各大洲的殖民扩张和文化输出，在工业化进程中处于被动态势的其他地区和国家都先后受到欧美政治思想、社会观念、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在这样的文化冲击下，它们对于本土的群体关系、群体结构、群体认同的意识体系方面也被迫进行了调整。但是这些国家由于自身发展历史、文化底蕴、人口规模各不相同，它们在西欧式“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很不相同，政治与社会结构、思想体系发展的轨迹也各不相同，这就使欧洲早期工业化国家、美澳新兴移民国家、亚洲文明古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各国在民族关系、族群结构、认同意识方面出现了极大的差异与多样性。这使得各国之间的交流与核心观念的翻译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民族国家”继承了原来多群体帝国的版图与民族结构（如中国和俄罗斯），有些地区则在殖民政府的管理下得到行政的统一并逐步演变成“想象的共同体”（如印度尼西亚），有的群体（如阿拉伯人）则在各殖民国家的共谋中被肢解为不同的政治实体。

近百年中各国的分分合合，既反映出历史上群体边界的痕迹，也反映出当代国内外政治与宗教势力的干预。所以什么是“民族”（nation），谁和谁同属或不同属一个“民族”，哪些群体可以被称为“民族”（nation）并可以通过“民族自决”而成为独立国家？哪些群体呈现的特征主要是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在政治结构中只是一个多族群国家的“族群”？或者哪些群体在社会动态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淡化了原有群体的“民族”色彩而

演化成为“族群”? 在这些问题上, 往往会出现非常不同的观点, 而且影响人们接受或反对某个观点的原因越来越带有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色彩。所以在今天, 谈论“民族”或“族群”问题是不可能回避这些议题中所具有的政治含义的。

即使是在某个国家内部, 由于各地区、各群体在历史与现实发展方面的差异, 各群体可能处在社会、经济、文化、群体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 所以在互动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与立场可能是有冲突的, 而且再具体分析每个群体内部, 其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也许是不一致的, 群体中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利益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在民族与族群研究中, 由于学者们的着眼点不同,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得出的观点也会不同。

在思考民族和族群问题时, 有的人考虑本群体甚至是本群体精英集团近期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 有的人考虑整体群体的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 有的人关注本群体的文化遗产如何保存与继承; 有的人关注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态势中如何使本群体最具有竞争力并得到发展; 有的人考虑根据历史与文化特点如何使本群体走向“自治”甚至“独立”, 认为这样本族才可以“扬眉吐气”, 在一个政治实体中成为“一等公民”; 有的人则认为所谓“一等公民”只有相对于“二等公民”才有意义, 这种追求隐含着在未来“傲视”(“压迫”)“二等公民”(即本“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群)的潜在愿望, 是过时的“民族”观, 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势, 这种追求只会导致群体冲突与内战, 对任何群体都只能带来损害; 有的人认为以个人的“公民权”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目标; 有的人认为维护历史遗留下来的群体边界并使之发展成为现实中的“国家”边界是群体的最高利益; 有的人认为“民族”会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社会民主化会迅速消失; 有的人认为“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潮会比阶级结构、意识形态更为“长寿”,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仅不会淡化反而会随着与“全球化”对应的“本土化”思潮得到加强; 有的人认为祖先留下的语言是群体

最核心的文化遗产，本民族语言在应用中的弱化是本民族消亡的先兆；有的人认为全世界语言的整合是科技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会逐步强化而“文化传统载体”的性质会逐步淡化。以上种种认识，不一而足。应当说，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只是视角和观察事物的着眼点不同而已。其实，没有一种视角或观点是绝对正确或完全错误的，在某地某时是符合当地群体民众根本利益的作法，在应用到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历史阶段和另一个群体身上时，可能对当地群体民众的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些争论中，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是讨论具体问题并争取共识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因为这里考虑到了具体地区、具体时间、具体群体的现实问题与发展态势，通过了解这些具体情况和了解当地大多数民族的意愿和接受程度，我们才有可能去探讨有效可行、能够被大多数群众接受的观点与作法。

与具体制度、政策和作法的制定工作不同，在学术上应当没有“禁区”，各种观点都应当允许畅所欲言，通过学术讨论争取逐步形成共识，一时形不成共识也没有关系，真理有时候是在少数人手里，各种观点最终都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所以在制定和调整制度与政策时，需要特别小心与谨慎，需要审时度势，了解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但是在进行学术研究与讨论时，还是应当允许一些“超前”的研究，允许一些关于未来发展大方向的讨论，允许一些跨国比较研究，允许在基础理论方面进行反思。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还是可以区分开的。把两者混在一起，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吃了大亏的。

可以说，在现代人类社会，从事有关“民族”和“族群”研究必须关注“民族政治”。无论是社会学还是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中，民族主义和种族—族群问题一直是一个核心研究领域。而新中国成立近六十年来，我国的民族研究大致还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框架中推进，对于西方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中所积累的知识体

系的了解，还是比较有限的。关凯的这本《族群政治》就是试图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民族”和“族群”研究进行一个整体框架的梳理，我觉得对于我们拓展视野和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凯在国家民委机关工作了近二十年，很了解我国传统的民族理论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民族政策，同时又有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社会调查的经历，因此他对基层社区的民族关系状况也十分熟悉。在这样的工作经历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并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参加了由我牵头组织和由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课题调研工作，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有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他后来在香港科技大学学习了两年，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学科基础，这对于他理解和研究中国的乃至全球的民族问题无疑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这本《族群政治》是关凯在香港学习期间完成的，文字生动，观点明确，思路开阔，集中体现了他这几年在民族理论问题上的一些思考，在不少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具有创新性的思路与观点。例如他对比了政治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在民族研究方面各自的特点，这是方法论上的有益探索；而他把“民族”和“族群”的演变放到“国家建构”（nation - building）进程中来加以分析，恰恰是抓住了现代“民族”问题的关键；而把“公民身份”与“族群认同”放在一个轨道上来审视，有助于我们看到“族群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势；特别是把国家政策与族际关系联系起来讨论，他对“文化多元主义”和“自治”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全球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趋势的讨论，这些都是当前国际上研究民族和族群问题的核心与热点专题。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国内当前有关民族问题的学术讨论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民族和族群问题是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发展

中不可避免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有 56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已经超过 1 亿，民族自治地方总面积约为我国陆地面积的 64%，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各民族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后资源与利益分配的新机制，人口迁移急剧推动了各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与共事，国家发展必然推动的区域经济整合与文化整合对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组织和语言文化也带来了冲击，境外不希望中国强大的政治与宗教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利用民族与宗教问题来挑拨民族矛盾与宗教冲突，所以所有关心中国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创新的人，都应当来关心民族问题并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思路。

当然，在这一讨论与分析过程中，人们的分析思路可能是很不相同的，还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观点，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完全正常的，不仅不足为怪，而且也只有通过各种观点的“百家争鸣”才能在相互启发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使我们得以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哪一种思路与观点符合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与现实国情，哪一种观点更接近真理，只有通过事实检验、社会发展的检验才能够知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加入到对民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中来，也特别希望中国的综合大学在今后能够更加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与教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这些年来全国各大学里都陆续设立了无数的“研究中心”，但是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最好的几所综合性大学却没有设立民族问题的研究机构，我认为这是一个缺憾。可能有些人认为既然中央设立了“民族大学”，就可以把民族问题留给民族院校去研究了。民族问题研究绝对不是几所民族院校的“专利”，也不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研究机构的“专利”。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还是需要突破一些传统的思维框框才好。

马 戎

2007 年 5 月 1 日于蓝旗营

序言三：族群政治：理论之本土化 与实践之全球化

Ethnic Politics: The Localization of Theory and Globalization of Practice

21 世纪曾被认为是族群政治不复存在的时代。然而，尽管族群认同在人类社会出现已有数千年之久，但族群政治在当今世界的影响也许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引人瞩目。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一种现象或许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无论如何，关凯这本关于族群政治的前沿著作的出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种现象。

20 世纪，随着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其欧洲起源地传播开来，这些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各自的支持者们都曾经预言族群认同将渐渐淡化，因为市场或阶级的同质化的力量会将国家和国际政治提升到首要地位。这些力量确实创造出了有竞争力的身份认同资源，不过族群性（ethnicity）同时也得到了强化。当国家和超国家的政治力量一直试图把不同的族群结合进国家和国际政治框架，族群政治却并未从人类社会淡出或者消失，只是变换出新的面目。

自由主义未能消除族群政治的原因在于，在 500 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有的西方普世主义都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征服与控制伴随始终。自由主义也一直与民族主义紧密偎依在一起。自由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将在自己家园上发生的国家化过程看作是建构帝国的根本，他们相信这对持续的经济扩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帝国曾被假定可以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升它的建设者和被统治者的境界，并将他们的关怀从特殊性转移到普遍性上来。这种普遍主义对族群政治不予承认，或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族群不与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相关联，比如全球化市场，并显然将其埋葬

在西方的政治规范之下。

自由主义的帝国建设者们致力于将族群融进主体民族之中，这使得族群之间的竞争加剧。与此同时，他们试图强迫族群将其对族群平等和保持文化的要求置于精英的国家化目标之下。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这种不平等的和同质化的工程都遭遇到抵制，甚至在那些少数族群被认为已经同化了的国家里，族群政治都有表现，并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政治分配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帝国的殖民地及其被统治者当中，族群政治更为昭显地占据着关键角色。对一些处于自己统治下的国家，帝国的建设者们在国家之间或某个国家的内部划分政治边界，他们优待某个族群，通常是为了实现更好地控制。生物的和文化的种族主义，而不是世界大同，成为自由主义帝国工程的核心支柱，这在所有的地方都造成了对族群政治的需要。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承诺将消除族群政治。大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一条从族群意识暂时增强的起点通往永久消除这种意识的路径被清晰地勾勒出来。社会主义政治家们认为，在他们将统治的那些国家里，要想缓解原来业已存在的族群间的怨恨，只有建立族群化的治理形式。在前苏联和中国，政策的两个基石都是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优惠政策，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都为少数民族至少提供了少量的文化自治。这种方式要求国家开展正式的民族识别，在一些案例中，一些少数民族被“创造”出来，族群政策和族群意识也因此被固化。另外，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承认过族群政治的存在。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在于族群政治是否是造成这些国家解体的关键因素。有人提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对族群冲突的“压制”是一种靠不住的手段，实际上，正是族群制度和族群政策培育出了族群意识并侵蚀了社会主义。这种论点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族群政策确是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这一点

上,前南斯拉夫倒可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长期不在这个阵营之中。事实上,社会主义遭到挫折的更为显著的决定性因素是来自西方的压力和诱骗与无法达到目标的内部政策之间的互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尽管族群意识和族群政治一直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但对于超族群意识和效忠国家意识的有预见的建构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即使在南斯拉夫,在它被冷战结束后螺旋式的族群动员撕裂之前,它的政策也有这样的效果。

当自由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可能低估了族群政治的耐久力时,关于族群政治的研究,只有很少的文献能走得比描述性文字更远些。这不仅是因为缺少理论,也因为存在着对于族群政治值得不值得研究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为族群政治研究提供了意外的推动力。在欧洲和亚洲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其他反人类罪行以及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引发了对族群问题的普遍关注,人们迫切需要理解族群问题如何影响了国家与国际政治。在发达国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族群政治的研究才开始结出硕果,并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广泛地理论化。几乎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出现,来自这些地区的学者在族群政治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于中国来说,族群政治或许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中国学者在这个“非常敏感”的领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经验研究文献,尽管这些学者通常转述西方的理论,而不是直接对理论做出贡献。然而,关凯这本著作的出版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转变的标志,在继续强调“中国特色”唯一性的同时,这可能成为族群政治理论本土化的一个起点。理论无疑是需要本土化的,中国拥有丰富的族群政治的经验,由中国学者将本土经验进行理论化概括,对那些在中国之外产生的理论来说,这种贡献不仅是一种补充,并可能成为一种改造甚至是证伪,而由欧美学者占据的理论主导地位因此可能被削弱。

中国在族群政治研究方面的贡献应具有与这个国家在当今世界的影响相匹配的位置，关凯的著作展现出这个创造过程应具有的学术宽度。他跨越了一个宽广的时间维度讨论族群的形成和族群如何塑造本地的、国家的和世界的政治，以及族群政治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演进线索。关凯将民族 (nation) 和族群 (ethnic group)、国家 (state) 和族群性 (ethnicity)、全球化和族群政治连接起来，讨论了一些重大的命题，如多元文化主义和自治等，他讨论的基础同时植根于国际的和中国的经验，而相对于前者来说，对中国经验的讨论是本书的亮点。这对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将起到一种“抛砖引玉式”的作用，我相信其他学者将继续这种讨论：尽管中国的国情与众不同，族群政治的实践却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在这个方面，每个国家的经验都对其他国家具有启发意义。只有从理论的本土化与实践的全球化这两个方面入手，才能真正理解族群政治。

沙伯力 (Barry Sautman)